十萬火急翻譯「李宗仁聲明」

李景賢

往事鈎沉

一九六三年秋至一九六七年春，我在中國外交部翻譯處俄文組工作。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上午十時過後，外交部辦公廳打來電話，讓我們翻譯處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五大語種，各派兩人去緊急執行一次特殊任務。我們十個人在處裡一邊集合，一邊在猜，什麼事如此「緊急」，而且又這樣「特殊」。世事難料，實在猜不出來！過了大約十分鐘，我們被帶到辦公主樓一間不大的辦公室。

過了不一會兒，辦公廳一位副主任來了，他高興地對大家說：「李宗仁先生回來了。他目前正在祖國領土的上空。他所乘坐的專機正從廣州飛來，估計兩個小時後就能在首都機場降落。」他告訴我們：周恩來總理屆時將率領黨、政、軍、群一大批領導人前往迎接。這位領導還說，李宗仁一下飛機就要宣讀他本人一項聲明，聲明的全文剛從廣州那邊傳了過來。之後，他即宣布了兩項要求：一、各語種要盡快把譯文拿出來，送文印處複印供散發用；二、自此刻起至下午解密止，任何人都不得離開所在的房間，如有人需上衛生間，辦公廳將讓專人陪同。我們曉得，這是執行「絕密」任務的一種特殊安排，相互間便交頭接耳了一番，思想上感到很緊張，因爲任務很重，而給我們翻譯的時間不足兩個小時。

對於李宗仁，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是桂系名將，曾在台兒莊大敗過日軍；蔣介石當年見大勢已去，被逼宣布下野時，讓他當過一小段「代總統」；老蔣兵敗退台時，他不願跟隨，而選擇經香港寓居美國。對他這位國民黨原頭面人物的回歸，我感到既意外，又興奮。

「李宗仁聲明」篇幅不大，只有兩頁A4紙，但寫得相當精彩，內容廣，含意深，情眞意切，極具感染力。聲明稿以白話文爲底本，夾雜着大量的文言文敘述，讀起來文不文，白不白的，頗感獨特。李宗仁的話主要是說給蔣氏父子聽的，他要「寄語留台的國民黨同志」：美國「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必欲據台灣爲己有，陰謀詭計，無所不用其極」；「何忍引寇自重，爲敵張目，甘爲民族罪人，國家蟊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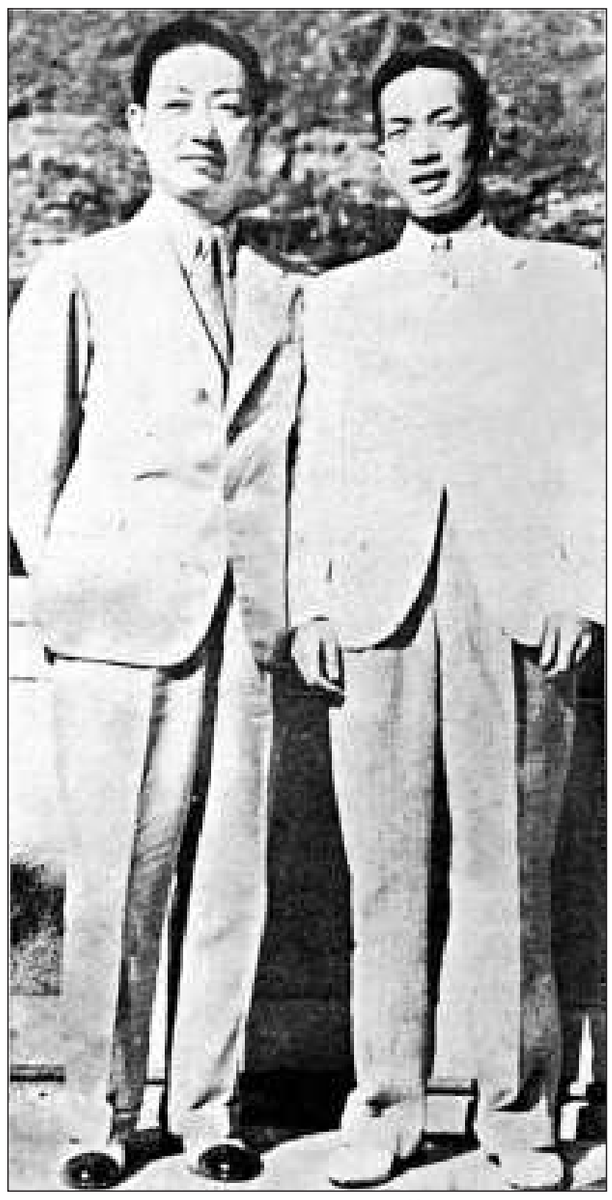
在「聲明」中，李宗仁還坦言，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曾「一誤再誤」。他最後說：宗仁老矣，對個人政治出處無所縈懷，今後惟願盡人民一分子的責任，對祖國革命建設事業有所貢獻。

聲明短但容量大，不了解背景是譯不好的。而且有些詞語深奧，用字生僻，像我這種漢語根基淺的人根本就看不懂。可是，給我們翻譯的時間卻很短，大家當時實際上又處於一種「被隔離」狀態，連查一查工具書都幾乎不可能。正在我們犯難的時候，一位主管領導趕來「雪中送炭」，花了短短幾分鐘時間，向我們扼要介紹了李宗仁此次回歸的來龍去脈，講了中央對原國民黨頭面人物回歸的政策，還對一些不易懂的詞語進行了釋義。五大語種的翻譯們用了不到兩個小時，就完成了任務。之後，我們就靜靜坐在被「隔離」的房間，等着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有關李宗仁抵京的實況轉播。大家對能爲這一歷史性事件盡一小點力，感到無尚光榮。一聽完了廣播，我們十人就興奮地離開了「隔離室」。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下午，李宗仁以七十四歲高齡，終於回到了闊別十六年的祖國首都北京，從而實現他那「樹高千丈，落葉歸根」的宿願。他的回歸，在台灣島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好些年過後我才得知，李宗仁的回歸之旅眞是荊棘叢生，策劃工作耗費了足足十年時間。

早在一九五五年，周恩來就利用李宗仁就台灣問題發表正面談話這一契機，親自運籌帷幄，好讓旅居在美國的李宗仁能早日回國。十年來，爲此目的，在北京、香港和瑞士的蘇黎世等地，通過李宗仁的原政治秘書程思遠、夫人郭德潔、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以及中國統戰部門的負責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周恩來還四次約程思遠秘密到京進行具體謀劃。李宗仁這次是從美國經瑞士回國的，他的回歸旅程險象環生。在周恩來的親自關懷和指揮下，由於我國特派人員的巧妙安排，李宗仁得以躲過台灣當局策劃的一個個暗殺計劃，於七月十八日平安地飛回到廣州。僅僅從瑞士到中國這一段，他就飛飛停停，差不多用了一周時間。



三十年代的薛覺先和梅蘭芳合影

薛覺先與梅蘭芳

崔頌明　郭英偉

左起：梅蘭芳、白駒榮、薛覺先

人與事

具有五千多年文明歷史的中國，在漫長的發展進程中，先後形成各種地方戲曲達三百六十餘種，在世界各國戲劇舞台上實屬罕見。在中國衆多戲曲劇種當中，京劇被視爲「百戲之首」，是我中華文明瑰寶，其流派紛呈，群星閃爍，遍及大江南北，爲廣大民衆所喜愛。京劇大師梅蘭芳，在半個多世紀的舞台實踐中，將我國戲曲藝術精華集於一身，創造了大家風範的表演藝術流派——梅派，使京劇面對西方並走向世界。在國內外，梅蘭芳被譽爲傑出的藝術家和美的化身，以他爲代表的中國戲曲表演藝術被認爲是當今世界三大主要表演體系之一。「梅蘭芳就是京劇」，這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民衆的一個觀念，至今仍在廣大戲迷心中迴響。植根於嶺南地區的粵劇，流行在廣東、廣西、港澳及海外粵方言（廣州話）華人、華僑聚居地區，是中國最早走出國門的一個地方劇種。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粵劇進入大變化、大發展時期，逐漸形成薛、馬、桂、廖、白五大流派，薛派影響最廣，爲五大流派之首，薛覺先被譽爲「萬能老倌」，是粵劇代表性人物，與梅蘭芳有「南薛北梅」之美譽。薛、梅出身經歷迥異，各自代表不劇種，天南地北，交往數十年，彼此交流劇藝，合作繪畫，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惺惺相惜，成爲莫逆之交，傳爲中國藝壇的佳話。

天南地北　各行其道

薛覺先出身書香門第，學戲半路出家。薛覺先於清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誕生在廣東順德龍江。其父薛恩甫，前清秀才，二十世紀初葉舉家遷居香港，在西營盤開設私塾與行醫。薛氏五歲進父親的私塾念書，打下國學基礎，後就讀於香港著名的聖保羅英文書院，受中西文化教育前後達十年餘。薛父病逝後家道中落，薛覺先任過工人、文員等職。薛覺先從小喜愛文學藝術，十八歲拜師學藝，沒有經過科班訓練，邊演邊學，邊學邊演，不斷進取，由於富有表演天分，加之勤奮好學，博取衆長，得到前輩藝人扶持、器重，很快成名走紅，成爲粵劇行內的佼佼者。

梅蘭芳祖籍江蘇泰州，出身梨園世家，祖父梅巧玲自幼被賣到北京學藝，後成爲著名旦角演員，父親梅竹芬也是名演員。梅蘭芳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出生在北京，比薛覺先年長十歲。梅五歲入私塾讀書，八歲正式拜師學習青衣戲，十歲在北京「廣和樓」登台演出，前後舞台生活五十餘年，入室弟子一百餘人，除京劇外，涉及多個地方劇種，桃李遍布海內外各地。

一身多角，「萬能老倌」。薛覺先能編善演，戲路很廣，兼工丑生、小武、旦、淨、末諸行，尤以飾演風流儒雅、瀟灑俊逸的小生戲最擅勝場。他多才多藝，能文能武，亦生亦旦，不論扮男扮女，同樣勝任愉快。

專精旦角，終生不易。梅蘭芳早年學青衣，同時還向名家學花旦、刀馬旦。除師承外，還刻苦鑽研，兼收並蓄，大膽創新，不遺餘力，把京劇中旦角表演藝術提煉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一九三一年，梅蘭芳、程硯秋、荀慧生、尙小雲分別當選爲中國四大名旦，梅蘭芳名列首位。北京有人寫下這樣的詩句：京師第一青衣劇，梅郎青衣又第一，梅郎每演青衣時，冷似梅花玉妃泣。

誠心學習京劇第一人。有見地的粵劇前輩，深知借鑒博大精深的京劇、崑曲的必要，薛覺先也毫不例外。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葉，年輕的薛氏在上海，經常觀看海派京劇、崑曲和江南民間小調，以吸取藝術養分，充實、豐富自己。他曾向「老將關公」、「伶界大王」林樹森學過不少紅生戲，並成莫逆之交。據崑曲名家俞振飛回憶，薛覺先是「京劇、崑曲迷」，「既熟悉，又熱愛」，他客串京劇《古城會》，與「林大王」同台演出，惟妙惟肖，無論行內行外，都一致好評。他認爲粵劇屬南派戲曲，其硬功好，表現線條重方形，出手有力，有剛強的本色；京劇經過宮廷的洗禮，提純較高，表現線條重圓形，方圓並濟。薛覺先突出粵劇的藝術風貌，從而樹立了自己獨特的表演風格。俞振飛說，薛覺先在舞台上「無論手眼身法步，特別是那種凝重、大方、高雅的功架，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來之於京劇和崑曲」，不愧爲學習、吸納京崑藝術的楷模。

將京劇推向世界第一人。梅蘭芳是我國向海外傳播京劇藝術的先驅，他於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五六年三次訪問日本，一九三〇年訪問美國，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五二年兩度訪問蘇聯，獲得盛譽，並結識了衆多國際著名的藝術家、戲劇家、歌唱家、舞蹈家、作家和畫家，同他們建立了誠摯的友誼。他的這些活動不僅增進了各國人民對中國藝術的了解，也使我國京劇藝術躋入了世界戲劇之林。他被美國波莫納大學和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授予文學博士學位。梅蘭芳在美國紐約、芝加哥、三藩市、洛杉磯演出後，引起強烈反響，獲得巨大成功。美國戲劇家貝拉司克聲稱梅「眞是世界上的大藝術家」；有不少西方觀衆認爲，梅蘭芳的戲「近情近理，人人能懂」，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梅蘭芳的京劇藝術，遂在西方上流社會，得到歡迎和肯定。

相識結緣　盡在鄉誼

二十世紀初葉，梅蘭芳在北京崛起後，應邀到上海、江蘇等地演出，很快名聲日隆，飲譽全中國。其間，到訪北京的中外遊人，都把「故宮」、「天壇」、「長城」、「訪梅君」、「觀梅劇」視同必要的遊程，以此作爲觀察北京、品味中華文化缺一不可的內容。可以想見，梅蘭芳在世人心目中的價值。

梅蘭芳南下穗港，征服南粵觀衆。一九二二年梅氏應香港太平戲院邀請，率「承華社」劇團一百四十餘人赴港演出，粵劇行會——八和劇員總工會（八和會館）搭起巨大彩牌樓，隆重「歡迎梅蘭芳暨全體北伶工友」，表達對中華國粹崇敬之情和對戲行同業的支援。一九二八年，梅蘭芳第二次率團到香港演出，隨後北上廣州，引起省城轟動，官方民間雀躍歡騰，稱梅爲「中國戲劇大王」、「世界化裝第一人」。海珠戲院門前馬路搭起四座牌樓，高八丈，每座牌樓兩邊均嵌上梅蘭芳十二尺巨幅劇照，以及「歡迎梅蘭芳蒞粵」大字標語。一時商業廣告都以梅蘭芳爲主題，大加渲染，「觀梅蘭芳佳劇，吸梅蘭芳香煙，國色天香，並皆佳妙」。梅蘭芳在廣州演出的名劇有《霸王別姬》、《天女散花》、《四郎探母》、《黛玉葬花》、《太眞外傳》、《上元夫人》等，據報載：當時「廣州達官貴人、鉅賈富豪都爭相一睹梅伶風彩。梅蘭芳原訂在廣州演出十二天，因社會反應熱烈，大受民衆歡迎，演出延長至四十天。歷史資料顯示，八十年前，也就是一九二八年，梅蘭芳在海珠戲院演出，跑場時，「只見人飛，不見足動，如同水上浮萍，順流而下，台步之美，令人歎爲觀止。劇院觀衆所有目光都集中在梅蘭芳一人身上，全場屏息，鴉雀無聲，跑場完畢，掌聲雷動，觀衆如癡如醉，舉院如狂。」梅派精美絕倫的藝術魅力，一舉征服了廣州的觀衆，在衆多歡呼聲中，社會上也有些不同反應。當時國民黨廣州市黨部由於梅蘭芳婉拒爲其作專場演出，而刻意製造麻煩，致函廣州市公安局，着其禁止八和劇員總工會召開大會歡迎梅蘭芳；有人發表文章，批評梅劇「提倡復古，鼓吹守舊……」。

（《薛覺先與梅蘭芳》之一）

經濟掛帥與詩詞欣賞

陳安

藝海草

詞學研究專家葉嘉瑩教授曾在北京文學館做過一次講演，最近我讀到其講演記錄（並非講演稿，因爲她講演從不寫稿），其中有一段話使我感觸甚深。許多學生曾問她，在如今經濟掛帥時代，學習古典詩歌有何用處。她答道：「（古詩詞）不但使你有一顆不死的心靈，而且使得你的心靈跟隨古人提升學問、品行、修養，達到很高的境界。不但有一種心靈的交匯，而且在這種心靈之中，體驗到你自己當下的存在，提升了你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我深感其言之有理，切中肯綮。是的，如果說我們曾經生活在一個「政治掛帥」、一切都服從於政治的時代，那麼如今，不論在東方或西方，似乎都讓經濟掛了帥，讓物質、消費和享受登臨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對文學經典作品，對古典詩詞，卻漠然視之，棄若敝屣。許多現代人心靈空虛，就是因爲他們與文學疏遠，與藝術脫節，而沉溺於超標消費和物質享受。

我們中國的古代文人，或許有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或許有仕途不遂的憤懣怨氣，或許有難捨難分的離情別緒，但一般而言，少有因沉醉於花天酒地而產生的精神空虛，他們更多地處於物質貧困、生活拮据的狀況，即使如此，他們也欣欣然不忘讀書寫作、遊山逛水。在田園將蕪的窮鄉僻壤，你可以看見剛剛歸來的詩人既耕又種、時還讀書。在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的環境中，你可以看見頭戴蓑笠獨釣寒江雪的詩人。在穿林打葉的風雨聲中，你可以聽見拄竹杖穿芒鞋的詩人高聲說着「誰怕？誰怕？」在北風捲地白草折的胡天雪地，你還可以聽見有詩人在吟誦「千樹萬樹梨花開」。……

陶淵明談人生經驗，要我們知道即使在車馬喧囂聲中，你也可以做到心靈的淡泊寧靜。李白希望我們不怕行路難，堅信有長風破浪濟滄海的時日。杜甫勸我們不去爲千秋萬歲之名煩惱，寂寞本就是身後之事。蘇軾看到門前流水尙能往西流，發問爲何人生就不能再年輕。辛棄疾要我們在清風明月之夜去稻田裡傾聽一片片蛙叫之聲。陸游要我們在山重水復疑無路的狀況下相信前面是又一個柳暗花明的村莊。

中國的語言很美，古詩詞的語言更美。不久前，北京人藝演員濮存昕應邀來紐約演講，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朗誦李白的《將進酒》。他那標準而清晰的發音吐字，抑揚頓挫的精心設計，悲愁豪爽之情的投入，使這首詞之美達到了極致，我心中不由得激動地感歎：「多美的詞！多美的語言！」我也因此更喜歡朗讀古詩詞，喜歡吟唱我已爲之譜曲的一百一十六首從先秦到到清代的詩詞。

讓那些經濟掛帥的人繼續拜金去吧，我們愛文學的人還是要讀我們祖先留下的詩詞，那一篇篇意境優美、開啓心智的楚辭、唐詩、宋詞、元曲。

車滿爲患

司佳

西洋鏡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農村溫飽問題逐步解決，都市富裕起步，可是神州仍是全球最知名的自行車大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自行車曾以排山倒海的陣仗讓外國遊客看傻了眼。這時，天津作家馮驥才推出預言小說，遐想中國日後大街小巷都是私家轎車，而且車滿爲患，眞是何等苦惱！作家當時想出這場景，有何根據？是怎麼回事？可能作家本人也說不出了。

然而，車滿爲患卻是今日中國一些大都市的眞實寫照。月前，筆者去上海虹口住宅小區「歐洲花園」訪友，園內停了很多私人轎車，到了晚間，有些路段幾近無法通行，好端端的花園小區碰上行路難！作爲訪客難免憤憤不平，居民的日常感受會怎樣？莫非天天像泥鰍一樣，在停車縫隙中鑽進鑽出？「說得極對，我們就是像泥鰍，在自己的園區內『鑽進鑽出』，但只能是這樣。」朋友後來才說，他曾反對過、吶喊過、抗爭過，而最終告別氣憤，選擇默默無言。

朋友批評，「以前建造『歐洲花園』時，就該爲每幢大樓造地下車庫的，可是當時僅有一幢大樓這樣做。才十年，就落後了，怪誰呢？眞要怪，也要責怪居民富得太快」。是，中國低估了致富的爆發力。不過，當年剛擁有住房的居民，又有誰想到接下來要購買私人轎車呢？「過日子」只是謙卑的嚮往，但其中暗藏着極頑強的秘密心思，那就是，「要過更好的日子」，而且「眞正地、不打折扣地過」。所以，不管以什麼名義阻止人們購買轎車，號召大家重騎自行車，絕對行不通。何況擁有私家車，更大程度是受虛榮心驅動，是無法壓抑的。虛榮和生活必需一樣，是生存的憑藉，是自然力的一種展示，在先富起來的人們中間，尤其如此。如此一來，人們對車滿爲患之痛，就懂得忍受，學會看淡和調適心態。除此之外，究竟還能怎樣呢？是，這是命運的一部分。

生命之思

朱國良

人生在線

人總是要死的，但人們對死的認識並不相同。英國著名作家H．D勞倫斯說：「它是生命的延續。」這一觀點相當浪漫。法國著名作家巴爾扎克說：「死是一個人的旅行到了終點。」在他的心目中，死是很平常的事，大有視死如歸的味道。中國古代的司馬遷似能從社會學的高度來看待這一問題：「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其實大多人的死，平平淡淡，從從容容，往往介於兩者之間——沒有如泰山般重，也不會像鴻毛般輕。因爲人的價值就在於他曾經活過和因爲他的「活」給人類的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留下過眞、善、美的印跡，只有這個印跡是存在過的，其價值僅在於此。其實我想，生命只有一次。詩人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但依我看，生命都化作荒草塵泥淹沒了，哪還有愛情可以演繹？寫過一代名著《紅與黑》的司湯達長眠於地下，其墓志銘只有九個字：「活過了，寫過了，愛過了。」可以看出他還是把「活」——生命放在第一位的。仔細再想，會發現生命是上天在每個人帳戶上存放的一筆定額儲蓄，生前沒有人知道它究竟有多少，卻每天都在開支消費它，直到有一天出現赤字。儘管我們知道，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然，不管願意不願意，誰也不能避免。但當死神扣響門鈴，閻羅派人索命，一般人都還是忌諱的。「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村級駐京辦

蕭愚

繽紛華夏

首都北京因其政治地位特殊，形成了大量外地駐京辦事處雲集的情況。據統計，目前約有五十二家副省級以上駐京辦事處，五百二十家市級和五千家縣級駐京辦事處。

一般來說，縣級政府是設立駐京辦的最小行政單位，村級政府設立駐京辦則屬鳳毛麟角，但鳳毛麟角並不表示沒有。位於北京海淀區四季青杏石口路的大寨北京辦事處即爲一例，是北京少有的村級政府駐京辦。

北京市民葛先生曾經開車帶着家人去八大處遊玩，快到杏石口路與旱河路交界的十字路口時，突然瞥見路北一棟樓房頂上「虎頭山酒樓」的紅色看板，隱約覺得似曾相識。他索性放棄了原本的遊玩計劃，改成了大寨駐京辦憶舊。

回想起幾十年前到大寨參觀學習，葛先生只能用「虔誠」和「激動」兩個詞來概括當時的心境。

撥通大寨駐京辦的電話，話筒裡傳來：「這裡是大寨駐京辦，查號請撥零」之類的程式化錄音，按照地址尋找，在臨街的一棟樓房上赫然立着「大寨北京辦事處」的紅字標牌，大樓入口乃是虎頭山酒樓的大門。

據虎頭山酒樓總經理陳先生介紹，大寨駐京辦的大樓內只有一、二層爲虎頭山酒樓，其餘則當作寫字樓出租給各個公司。大寨駐京辦也沒有設置固定的辦公室，本應由駐京辦辦公室負責的接待和聯絡等事務均由虎頭山酒樓全權代理。

但陳先生總也少不了提及這兩句話：「設立駐京辦的村政府恐怕也就大寨一家了」、「成立駐京辦是想將大寨這面紅旗插在北京，讓大寨精神還能繼續傳承下去」。

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人，大多對大寨有着深刻的印象——「全國農業學大寨」、虎頭山、七溝八樑一面坡、帶領大寨人治山治水的農民副總理陳永貴、當年的「鐵姑娘」郭鳳蓮等等。一九六四年二月十日，《人民日報》刊登的一篇通訊《大寨之路》，將大寨樹立爲農業戰線上的一面紅旗，掀起「農業學大寨」的風潮，全國各地前往大寨取經的先進分子絡繹不絕。大寨村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讓大寨駐京辦也多少帶上了懷舊色彩。

負責本地領導來京的接待，是各地駐京辦的主要工作職能之一，也正是因爲駐京辦特有的地方鄉情，不少地方領導或來京公幹人員都願意入住駐京辦下屬賓館或招待所。然而僅有上下兩層的虎頭山酒樓只能提供餐飲接待，顯然負擔不了駐京辦應有的住宿接待功能。

陳先生解釋說，大寨村村幹部來京出差的機會並不多，辦事處也沒有多少在京業務可聯絡，沒有必要設立客房用做住宿接待。

和大多數各地駐京辦飯店一樣，虎頭山酒樓也布置得如同賓館的宴會大廳，桌上鋪着落地的淡黃色桌布，靠背椅套上了紅色的椅套。酒樓內僅有某些細節與大寨有關，餐廳牆面上懸掛着昔日大寨的黑白老照片；筷子套都印有「走進大寨村」的字樣；作爲企業培訓項目之一，每天中午營業之前酒樓服務員都要齊唱大寨歌，歌聲雖整齊，卻能聽出充滿了形式感。